

传统村落“实体—表征”空间的叠合 与分异机制研究

——基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内传统村落的考察

庞亚婷 特里·N. 克拉克

摘要 传统村落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空间载体,其保护与发展已从物质存续深化至对空间内在结构与文化意义的整体性探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内传统村落在实体与表征维度上非均衡分布与区域分异特征突出,自然环境基底、文化遗产政策与区域发展进程等因素的多维耦合形成了其空间叠合分异格局。可通过构建文化生态补偿区以缓解“核心—边缘”空间梯度差异,创新跨尺度治理网络,借助场景化再生策略,转译家国文化符号、活化仪式空间,强化具身体验,重建“人—地—文”之间的有机联系,实现传统村落从“遗产话语”转向“空间生产”,提升其整体性保护效能。

关键词 传统村落;实体空间;表征空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中图分类号 G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1-0030-14

基金项目 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城文化生态研究院)项目(SDCC2025002)

传统村落作为农耕文明的结晶,其保护发展已由物质形态存续深化至对空间内生结构与社会文化意义的整体性探求。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文旅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的内生空间结构、多元主体的空间感知与实践构成了传统村落活态传承的效能核心。尽管传统村落研究当前已形成丰硕成果,但对其物质实体与文化表征之间的空间关系,仍缺乏整合性的理论框架与系统性的实证检验。故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观察场域,揭示传统村落“实体—表征”空间叠合与分异的生成机制和区域格局,提出“解域—构建”的空间优化路径,为传统村落从遗产保护话语转向活态空间实践提供具有解释力和操作性的理论框架。

一、传统村落空间研究梳理

传统村落是人类与自然长期调适共生的过程中形成的人地关系有机体。20 世纪初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导致乡村空间不断被挤压和异化,这使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受到学界高度关注。

(一) 传统村落的内涵演进

“传统村落”的概念始于“古村落”,意指历史遗存、地域环境、整体氛围及文化脉络均得以承续的古代村落^[1](P6),本质上是以家庭为单位,基于特定地域的社会组织单元^[2](P4-5)。2012 年,“古村落”正式更名为“传统村落”,其作为兼具物质和非物质双重属性的村落遗产类型得到学界认可^{[3][4]},并将传统村落景观划分为聚落景观、经济景观、社会景观和文化景观^[5](P1-3)。概念的演进推动了研究视角的转变。基于“物质空间—社会结构”双重视角,传统村落超越物理空间容器,成为社会关系的载体与文化意义的

象征^[6](P90-96)。Alnaim发现了与传统村落基本环境相适应的生活需求机制隐藏秩序^[7](P223-238),村民的惯习和村落形态形成了地方性的文化特征,构建起自然生态、社会活动、生计模式和文化信仰四种空间类型^[8](P163-168)。

(二)传统村落空间结构与分布动因研究

以列斐伏尔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为基础,学界形成了多层尺度与多维主体的理论模型。陈波将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分为日常生活文化空间、艺术创造文化空间、记忆经验文化空间和信仰价值文化空间^[9](P61-71)。曹海林关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10],认为其包括有形的物质性结构空间和无形的精神归属空间^[11](P22-29)。案例实证方面,研究主要分为两条路径:一是关注传统村落的时空演化与重构动因。杨馥端^[12](P2172-2190)、杨灿灿^[13](P174-180)等学者基于符号消费和场域理论,剖析空间演变的外显表征和内隐动因,提出空间重构路径。二是聚焦其宏观布局及影响因素,揭示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是地形、水文、生态、经济、人口、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4][15]},传统村落空间分异作为空间变迁的核心特征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为本研究识别“实体—表征”空间叠合分异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三)文化符号与实体空间的关联研究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作为区域自然和人文复合体^[16](P382-397),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实体空间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17](P1609-1622)。借助于地理数据分析技术,现有研究多使用核密度分析、重心指数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流域^{[18][19]}、地域^[20]或省域尺度内的非遗与传统村落分布和关联进行解析,虽然揭示了非遗等文化符号与传统村落实体空间的分布关联,但对二者的互动机制缺乏深入理论阐释。此外,量化分析多从外部视角切入,对文旅融合背景下空间主体的感知关注度不足,整体保护精准施策的空间认知基础薄弱。故本文尝试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聚焦传统村落“实体—表征”空间分析框架,不仅从宏观格局上检验二者的叠合与分异,更从中观机制与主体感知层面探究其内在关联,以期在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保护与活态发展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新视角。

二、传统村落空间叠合分异的解析逻辑

“古”是传统村落的底色,以生态和谐为基本理念,传统村落形成了山水村田的空间格局和有机系统。其中,传统建筑和村落结构美学承托起地域特征明显的空间载体,人们在此间世代生产生活所形成的民俗节庆、传统手工艺和风俗习惯构成了村落内传承赓续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

(一)从空间三元论到操作性二元框架

列斐伏尔将空间生产归结为三个交织维度:空间实践,即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基础;空间的表征,即权力阶层主导的空间秩序;表征的空间,即蕴含着复杂社会象征意义的直接生活空间。大卫·哈维继而提出“空间构型”^[21](P262),认为资本的流转使空间中无法流动的固定资本成为构型的物质层,借助资本和劳动力建构形成“第二自然”,即社会化的“人造环境”;通过对人们行为风格、思维方式和消费理念的调整,使空间构型的社会层面总是适配于物质层面。因此,物理构型作为社会构型的基础动能,空间关系的重构与社会关系的更新共同推动了空间再生产。

长期来看,三次社会大分工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持续改变着传统村落的形态功能和空间构型。我国村落呈现出从高度分散到相对集中、从庭院式形态到整体式布局、从单一功能到复合功能的转变趋势;其空间结构多以村落道路为空间骨架,串联起生活功能区、生产功能区和服务功能区等。传统村落空间作为生产实践建构形成的社会关系的集合点和关键点,成为物质与符号相结合的产物^[22](P111)。

结合地方性来源框架^[23](P19),传统村落空间可解构为村落自然地理环境、建筑民居等人文景观及村落社会活动。其中,自然地理环境成为传统村落空间构型的根基。地质水文、气候湿度、路网格局等成为影响村落空间布局和选址的条件,也是村落景观和乡村性的形成基底。村落空间美学、风俗民情、历史文化等景观强化了传统村落的地方性特质,人们的社会交往与活动则进一步建构起特色化的社会

形态。作为自然和社会的地域综合体,传统村落以空间实践为媒介,杂糅了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支撑起独特的时空结构。因此,以社会实践为出发点,传统村落空间实现了物理环境、符号生产和身体感知的统一(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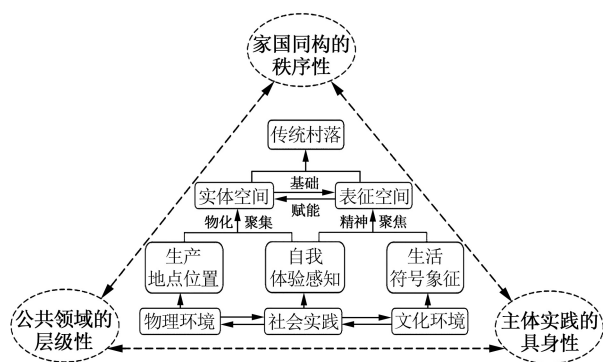


图1 传统村落空间结构模型

本文聚焦传统村落“物质环境”与“生活意义”这两个最基本、最内在维度的互动,对空间“三元论”进行聚焦与转译,以实现哲学理论向可操作、可量化研究工具的转化。“实体空间”对应“空间实践”的物质层面,指传统村落中可被观测、具有实体物理形态和位置的物质总和;它是人类空间实践长期调适的结果,构成了村落社会存在与延续的物质基底,代表空间实践的物化格局。“表征空间”对应“表征的空间”,指传统村落中被多元主体通过文化实践、集体记忆和身体体验所赋予意义、情感与象征价值的空间维度。它并非物态空间的完全镜像反映,而

是一个动态的、主体性的意义生成领域。而“空间的表征”(如官方保护规划和社会互动过程等)则贯穿其中,以更清晰地透视物质基础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原生张力。

(二) 传统村落的空间属性解读

乡村作为物质空间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具有物质性和社会性,其内隐文化属性也使空间具备了可建构、可兼容和可嵌入的特征^[24](P95-108)。作为民众的“生活场”和“文化场”,传统村落综合价值突出,其核心属性可解构为三个维度。

第一,家国同构的秩序性:从村落布局到国家隐喻。传统村落是“家国同构”伦理体系在空间上的物化体现,通过将微观家庭伦理与宏观国家秩序衔接,展现了对社会秩序的表征。在传统村落中,民居是体现和传承“家”文化的基本单元,也是在地化“传统”的生成起点;其大多基于院落式布局,形成“轴线对称—主次分明”的空间等级架构,物化呈现“长幼有序”等传统理念;建筑常以祖堂或宗祠为核心,向外逐层扩散,形成“向心性”权力拓扑结构。庭院内部则以厅堂为中心建构起家庭政治的“仪式剧场”,“天地君亲师”牌位、祖先画像和楹联家训构成了“家空间”的三重符号系统,持续生产着宗法礼制、忠孝观念和社会等级的文化意义。日常家庭仪式与节庆活动进一步激活强化了这种空间秩序,使人们在身体实践中内化从“家屋”到“天下”的认同逻辑。

第二,公共领域的层级性:从物理场所到社会网络。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创设了爱德华·索亚提出的“第三空间”^[25](P12),兼具物理空间的可达性和场景化仪式所激发的集体认同。根据功能和象征意义,传统村落实体空间包括:以庙宇、宗祠为代表的核心神圣空间,是人们祭祖议事的功能性区域,承担强化血缘—地缘共同体的功能;以井台、桥头为代表的日常交往空间,承担着日常汲水和信息交换的功能,成为村落“弱关系网络”的枢纽;以晒场、戏台为代表的节庆展演空间,是庙会 and 社戏的举办场,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进一步得以释放。在表征层面,社会实践赋予了物理场所社会意义和文化功能。神圣空间的仪式生产着集体敬畏和认同,交往空间滋养着社区的日常情感连结,展演空间则构设出社会公众对田园诗性空间的共同想象。

第三,主体实践的具身性:从身体铭刻到意义生成。认知根植于活动实践,传统村落的空间活力根源在于多元主体的具身化实践。村落居民与外来游客通过具身活动完成从物理环境(实体空间)到个人认知与情感(表征空间)的意义转化。村民的生产性劳作在土地上铭刻了“劳动的身体”,生活性仪式则传承了“仪式的身体”,游客经由行走于村巷、品尝美食和参与民俗活动,建立起与空间的链接,使抽象的

文化符号和历史叙事转化为鲜活的情感与记忆。政府“自上而下”的保护政策与村民“自下而上”的文化传承需求借助多元主体的实践实现碰撞、协商与融合,推动在地知识的再生产和村落基因库建构。

(三) 传统村落空间叠合分异概念模型

列斐伏尔强调空间生产的“具身性”,认为空间的实践过程隐匿了社会空间,只有通过对社会空间的解码,才能解释其空间实践^[26](P167-191)。村落主体在社会实践中,对物理环境进行改造和生产,形成物化的地点及位置,如山林田地、村落道路、水井祠堂和民居等。实体空间承载了传统村落的秩序和规范,也反映了空间中的权力平衡。与此同时,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聚焦形成传统村落表征空间,如节庆仪式、手工艺和传统艺术等,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与物理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实践文化符号。实体空间是表征空间的载体,也是其赖以生存的原始土壤;而表征空间作为传统村落的文脉根源,体现了空间主体共同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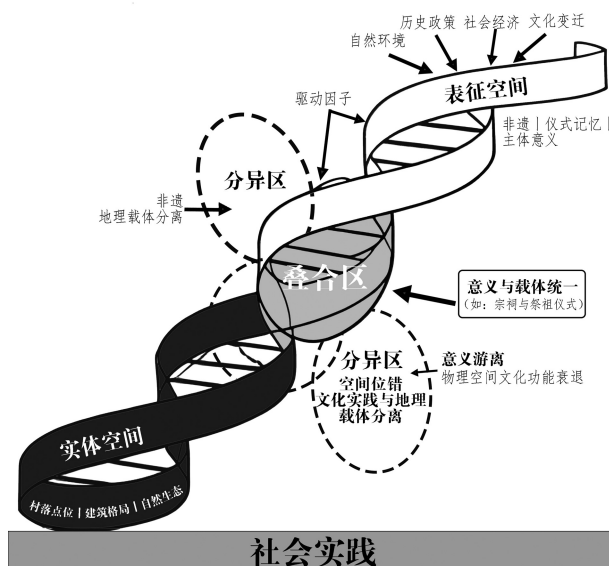


图2 传统村落“实体—表征”空间叠合分异模型

传统村落的实体空间与表征空间互为表里,动态开放,其“叠合”与“分异”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连接谱(图2),共同描绘了空间结构的复杂性。自然环境基底、历史进程、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等多重耦合力量驱动着二者的交互发展。当实体空间与表征空间在区位和意义上高度耦合时,即“叠合”,指特定地理单元内,传统村落的实体空间与表征空间在分布上高度重叠、在功能上互相支撑、在意义上彼此强化的状态,其本质是物质载体与文化实践在同一场所内的深度交织与协同共生;如村落A的古戏台上传承并展演着地方戏曲B。当二者在空间上分离或意义上断裂(如非遗技艺的传承地与村落本体分离)时,即“分异”,指实体空间与表征空间出现偏离与脱节,甚至在意义上产生矛盾,其本质是空间的物质形态与文化意义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断裂与疏离,表现

为空间位错与意义游离。“叠合”和“分异”作为传统村落空间内在的、普遍的互动机制,对其测度需将二者从微观的质性关系转译为宏观的可量化的空间关系。在宏观实证中,通过核密度重合区来表示文化实践与物质载体在区域内的系统性共存与繁荣;通过中心模型偏移与空间异化指数来表示空间分异的程度。故本研究中的宏观实证分析并非直接观测微观的“意义”,而是通过捕捉传统村落与非遗这两类核心要素在宏观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关系”,来推断和验证空间“叠合”与“分异”这一对微观机制在区域尺度上的表现强度与空间格局。地理探测器对影响因子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驱动这种微观机制的系统性力量。

三、传统村落空间叠合分异的实证分析

叠合与分异是在物理基础上意义和空间的复杂编织,体现了传统村落空间的活力。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的村落,是经过国家权威认定的、在物质形态和格局风貌上保存完好的农耕文明空间实践载体,将其地理位置作为实体空间的代理变量,具有内在合理性。表征空间的核心是符号与体验,非遗作为“被生产出来的”活态文化意义和集体记忆,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身体实践和情感认同的复合体,也是表征空间最凝练、最外显和最易于识别的文化形式,故将其地理分布作为表征空间的观测指标。

本文突破单一行政区域阈限,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研究范围,将连片传统村落视为空间整体,基于物理空间投射与公众感知交叉论证的方法,对传统村落“实体—表征”空间叠合分异进行实证分析。

(一) 作为研究范围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长城作为大型线性军事防御工事,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伟大创造,不仅呈现了华夏儿女的顽强生命力,也见证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流交往与交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国首个以线性文化遗产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公园,涵盖了北方 15 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东起辽宁虎山长城,西至甘肃嘉峪关,约 60% 区段穿越山地(如太行山、阴山等),30% 位于高原(如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10% 跨越沙漠戈壁(如腾格里沙漠),地形特征决定了其内多数村落依山而建,形成了“堡—寨—烽”防御体系,体现了地理环境对军事设施布局的影响和民众的生存防御智慧。气候方面,长城沿线降水量自东向西递减,东部湿润的气候条件适宜农耕文明的发展,形成了“东农”文化特征;而西部地区干旱的环境促使了牧民文化和商道文化的兴盛,形成了“西牧”的独特文化景观。该公园是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之首,肩负着打造中华文化标识、强化文化自信与认同的战略任务。

为量化实证传统村落实体空间与表征空间,本文实体空间数据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表征空间数据源自国务院公布的 5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行政区划矢量数据源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数字高程模型(DEM)、河流、降雨、温度等数据源自地理空间数据云,经济社会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4 年《中国统计年鉴》。借助 Global Mapper 将原始 CSV 格式坐标转换为 GPS 标准坐标(WGS84),使用百度地图 Place API 编码传统村落名称和非遗保护单位的地理坐标,对于接口无法直接匹配或返回多个结果的对象,采用人工核对与地图辅助定位的方式进行确认与纠偏,确保点位数据的准确性。

如表 1 所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传统村落共计 2074 个,山西、河北和河南传统村落的数量位

表 1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传统村落空间数据

地区统计指标	实体空间	表征空间	平均高程	河流密度	平均气温	平均降水	常住人口/万人	GDP/亿元	第三产业支出/亿元	城镇化率	A 级景区数	文保单位数	文化名镇数
山东	165	186	156.3	0.20	15.1	680	10163	98565.8	52139.9	64.7	1248	2194	16
山西	619	182	1000.6	0.08	9.8	450	3481	25494.7	13257.2	59.6	268	1310	111
北京	26	120	43.5	0.15	13.0	585	2183	49843.1	32876.2	87.6	302	392	9
河北	276	162	484.3	0.12	13.5	550	7420	47526.9	23890.5	61.1	680	1254	15
新疆	53	140	961.2	0.01	7.9	150	2589	20534.1	10883.1	58.8	512	996	3
河南	274	125	312.8	0.13	14.2	700	9872	63590.0	33702.7	56.5	580	1575	11
内蒙古	61	106	1016.8	0.03	4.6	300	2400	26314.6	13946.7	64.7	420	727	5
陕西	178	91	876.5	0.09	12.1	600	3954	35538.8	18835.5	62.6	432	1367	16
青海	183	88	3190.4	0.02	5.3	300	595	3950.8	2093	57.4	142	517	1
甘肃	108	83	1432.7	0.04	8.7	400	2490	13000.0	6890	53.3	380	773	7
辽宁	45	76	229.4	0.18	10.3	650	4197	32612.7	17360.3	72.8	568	91	12
吉林	26	55	263.7	0.14	6.9	600	2347	14361.2	7635.5	63.4	320	495	5
天津	8	47	10.2	0.28	13.5	550	1373	18024.3	10245.8	85.5	127	27	3
黑龙江	26	42	307.1	0.10	3.5	550	3099	16500.0	8775	65.7	452	408	3
宁夏	26	28	1096.4	0.03	9.5	250	725	5502.8	2916.5	66	98	523	2

列前三,三省传统村落数量之和占比高达 56.45%;传统村落数量超过 100 个的有青海、陕西、山东和甘肃;剩余的省市(自治区)传统村落仅占 12.96%,在空间上整体表现为“中间多、两头少”的分布特征。其空间范围内共有 1531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项目高度集中于华北和华东地区,其中山东、山西、河北三省非

遗数量均超过 160 项, 合计占比达 34.62%, 形成明显的“华北高密度核心区”, 非遗数量超过 100 项的地市包括新疆、河南、北京和内蒙古; 其余地市非遗数量较少, 共占 33.31%, 呈现“东密西疏、南多北少”的总体格局。

(二)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内传统村落空间的叠合与分异

ArcGIS 是综合性的地理信息系统平台, 用于地理数据的创建、管理、分析、可视化和共享。本文主要使用 ArcGIS10.8 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传统村落“实体—表征”空间基础数据进行分析。

1. 研究方法

第一, 核密度估计法。核密度估计法通过分析并显示点状地理要素, 能够直观地反映空间上地理要素密度表面的空间集聚特征, 核密度值越大, 表明该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越聚集^{[27][28]}。本文运用该方法分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内传统村落二元空间的分布密度。计算公式为:

$$F(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quad (1)$$

式中: $F(x)$ 代表核密度的估计函数; n 为阈值范围内传统村落或非遗的点数; h 为带宽; $(x - X_i)$ 为地理要素点 x 到 X_i 的距离; $K\left(\frac{x - X_i}{h}\right)$ 为核函数。

第二, 重心模型。旨在通过确定某个区域内部地理要素的空间平衡点, 以反映各地理要素的空间变化和发展趋势^[29]。本文运用重心模型对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态势进行分析。计算公式为:

$$\begin{cases} X = \sum_{i=1}^n G_i x_i \\ Y = \sum_{i=1}^n G_i y_i \end{cases} \quad (2)$$

通过重心坐标计算传统村落重心与非遗重心空间偏离距离, 计算公式为:

$$D_{i-i} = R \sqrt{(X_i - X_i)^2 + (Y_i - Y_i)^2} \quad (3)$$

式中: (X, Y) 为区域地理要素的重心经纬度坐标; (x_i, y_i) 为第 i 个子区域的经纬度坐标; G_i 为第 i 个子区域某地理要素的属性值; (X_i, Y_i) 、 (X_i, Y_i) 分别为非遗和传统村落区域重心的经纬度坐标; R 为转换系数, 一般取值为 111.11。

第三, 空间异化指数。空间异化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旅游发展^[18]、人口与公共服务^[30]等领域。本文基于此构建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异化指数 (SMI) 及其贡献度 (G), 定量分析其空间分布的差异性。SMI 值的大小可反映实体空间和表征空间的分布相似性, 相似程度越低则表明空间异化程度越高, 即 SMI 的绝对值越大; 反之则越小, 空间异化现象越不明显^[31]。计算公式为:

$$SMI_i = \frac{1}{TV} \left(\frac{ICH_i}{ICH} TV - TV_i \right) \times 100 \quad (4)$$

式中: SMI_i 为 i 省空间异化指数, TV 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传统村落总数量, TV_i 为 i 省传统村落数量, ICH 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非遗总数量, ICH_i 为 i 省非遗数量。

第四,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用于探测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因子驱动力^{[32][33]}, 运用因子探测测度“实体—表征”空间叠合分异影响因素的解释程度, 计算公式为:

$$q = 1 - \frac{\sum_{h=1}^L N_h \sigma_h^2}{N \sigma^2} \quad (5)$$

式中: q 为因变量 X (影响因子) 对变量 Y (空间叠合分异贡献度) 的解释力, 其值越大表示因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解释力越强, 反之则越弱, $q \in [0, 1]$; L 为变量 Y 、因变量 X 的分类; N 、 N_h 分别为 Y 的单元数和层的单元数; σ^2 、 σ_h^2 分别为 Y 的方差和 h 层的方差。

2.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内传统村落“实体—表征”空间分布特征

图3中使用莫兰指数和核密度分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实体空间的聚类模式,莫兰指数为0.236, p 值0.018。 p 值在统计学上高度显著,说明存在强有力的全局性空间过程主导着实体空间的分布,如地形障碍、文化核心区、民族聚居区和交通线路等,它们共同作用导致实体空间非随机地集中出现。核密度清晰的集群格局印证了莫兰指数的显著性结果,并明确地指出了集群的核心位置,即3个高密度核心区和多个中密度核心区。首先,核心集聚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极化效应。山西、河北和河南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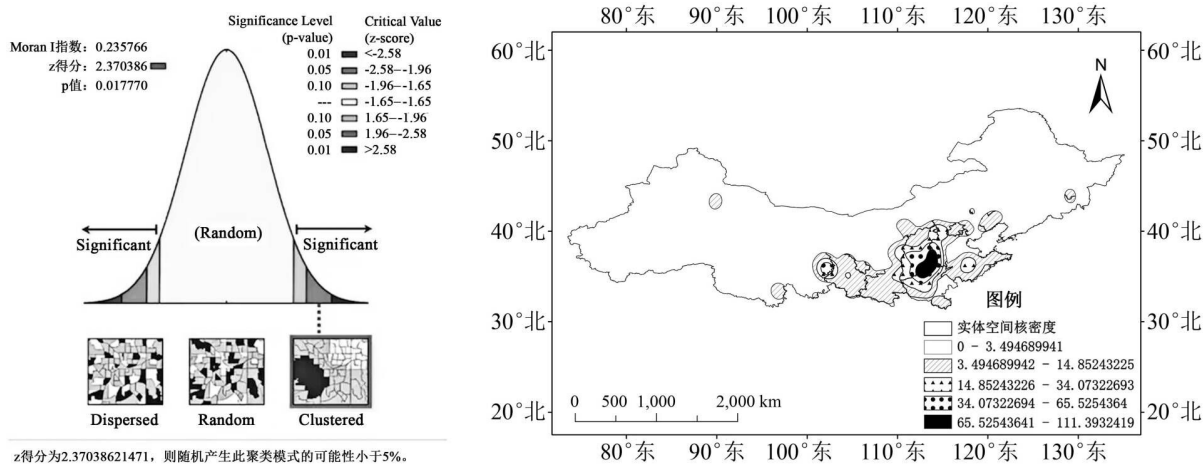


图3 传统村落实体空间莫兰指数及核密度分布

同构成了传统村落分布的“核心三角区”,其集聚度指数高达56.45%,这与该区域独特的黄土高原文化、历史上相对封闭稳定,以及现代城镇化相对滞后等因素密切相关。其次,次中心区呈现梯度过渡特征。青海省、陕西省和山东省形成西北—华北过渡带,其村落空间分布密度显著高于周边区域。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内表征空间的莫兰指数及核密度分析显示(图4),其呈现出高度的局部集群与全局相对随机并存的特征。莫兰指数为0.132, p 值为0.248,说明表征空间的形成发展主要依赖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独特环境、历史和文化因素。尽管全局性指标不显著,但核密度图揭示了表征空间不平衡的“大分散、小聚集”模式:呈现1个高密度核心区和多个中密度核心区。高密度分布围绕核心文明区、人口密集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富集。北京市保存了大量宫廷特色型非遗,山东省以传统美术、传统戏剧和民俗类非遗为主;山西省则突出表现为传统音乐、技艺类非遗与晋商文化的深度融合。中密度分布区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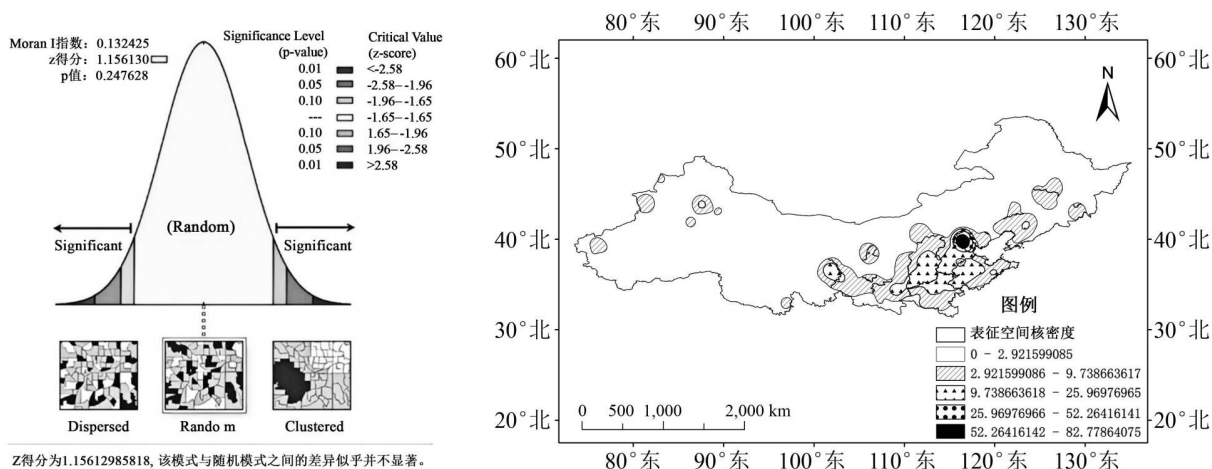


图4 传统村落表征空间莫兰指数及核密度分布

新疆、河南、内蒙古、陕西、青海和甘肃构成,共同形成“西北文化带”。该区域非遗民族交融特征鲜明,少数民族传统技艺、边塞民俗和游牧文化多元共生。其余为低密度分布区,主要涵盖东北三省及天津、宁夏等地,虽然非遗数量相对较少,但其地域特色突出,呈现出边疆民族文化“斑块状”分布特征。

3.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传统村落“实体—表征”空间的叠合分异

重心模型可用于分析非遗与传统村落之间的空间异化关系,计算二者的重心地理坐标和偏离距离以定量描述空间异化特征。表2和图5说明各地区传统村落的实体空间和表征空间在重心位置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偏移特征。其中,新疆、河北和宁夏的偏离程度最高,而陕西、北京和黑龙江的偏离最小,

表2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非遗与传统村落分布的重心及其偏离

区域	实体空间重心		表征空间重心		偏离距离(km)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111.595	36.947	111.510	38.602	165.81
山东	118.647	36.380	117.731	36.208	93.28
山西	112.573	36.783	112.238	36.966	38.12
北京	116.179	40.130	116.385	39.932	28.61
河北	114.355	38.000	115.869	38.436	157.60
新疆	85.994	42.313	83.503	42.437	249.35
河南	113.236	34.440	113.660	34.372	42.94
内蒙古	114.800	43.493	115.748	43.412	95.22
陕西	109.266	35.134	109.102	35.032	19.28
青海	101.469	35.468	100.652	35.797	88.08
甘肃	104.053	35.471	103.437	35.907	75.51
辽宁	121.419	41.204	122.489	41.180	107.00
吉林	127.777	42.794	126.878	43.544	117.02
天津	117.432	39.924	117.201	39.168	79.08
黑龙江	127.629	46.509	127.343	46.652	31.97
宁夏	106.176	36.190	106.142	37.685	14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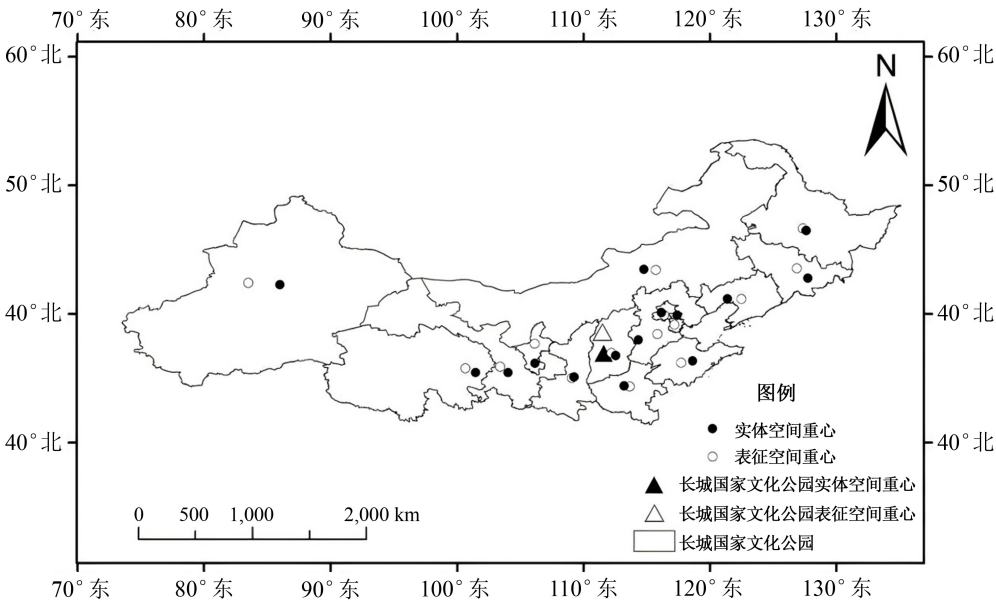


图5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传统村落空间的重心及偏离

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一致性。从宏观分布格局看,表征空间集中在山西省中部,而实体空间重心整体偏南(36.947°N),与表征重心形成约 165 km 的南北向偏移,其中宁夏和河北的实体空间重心显著南移,而北京和天津则北移,可能与城市扩张导致传统村落保护集中在近郊有关。从具体区域看,在高偏离区域($>100\text{ km}$),新疆的表征空间重心位于东疆,实体空间则集中在北疆,反映出绿洲农耕与游牧文化的空间割裂;受地理环境与历史战乱影响,河北的表征空间重心在北部一带,实体空间偏向南部;宁夏受流域影响,表征空间偏向北部河套平原;吉林的表征空间重心在长白山区域,实体空间则偏向松辽平原。而在低偏离区域($<50\text{ km}$),陕西的表征空间与实体空间高度重叠,北京受“首都文化圈”整合的因素影响,表征空间与实体空间呈现出协同态势。

本文引入空间异化模型,通过揭示空间叠合分异的不均衡性来识别保护盲点和发展压力,从而进一步指导资源配置。依据 SMI 值,本文将传统村落空间叠合异化指数划分为 6 类:正向高异化区($\text{SMI} \geq 5$)、正向中异化区($2 \leq \text{SMI} < 5$)、正向低异化区($0 \leq \text{SMI} < 2$)、负向低异化区($-2 \leq \text{SMI} < 0$)、负向中异化区($-5 \leq \text{SMI} < -2$)、负向高异化区($\text{SMI} < -5$)。异化绝对值表示在特定空间内实体空间与表征空间地理要素的集聚程度,即正向异化区说明表征空间分布更具优势。从表 3 可知,分析区域以正向中异化区为主,包括山东、内蒙古、辽宁、吉林、天津等地,占比达 38.5%。

表 3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传统村落空间异化指数及类型划分

地域	SMI	异化类型	特点
山西	-18.40	负向高异化区	实体空间相对分布规模更具优势,高异化类型
河南	-5.34		
河北	-3.10	负向中异化区	实体空间相对分布规模更具优势,中异化类型
青海	-3.28		
陕西	-2.85		
新疆	6.85	正向高异化区	表征空间相对分布规模更具优势,高异化类型
北京	9.10		
山东	3.78	正向中异化区	表征空间相对分布规模更具优势,中异化类型
内蒙古	3.75		
辽宁	2.63		
天津	2.58		
吉林	2.36		
黑龙江	1.40	正向低异化区	表征空间相对分布规模更具优势,低异化类型
宁夏	0.51		
甘肃	0.03		

在异化程度上,高异化区涵盖山西、河南、新疆、北京等省市(自治区),其中山西和河南作为典型的负向高异化区;而新疆和北京则因文化资源高度集中或政策支持力度大成为正向高异化区。中异化区覆盖 53.8% 的省份,表明多数地区表征空间与实体空间分布的协调性处于中等水平。低异化区仅占 15.4%,包括甘肃、黑龙江、宁夏,反映出其表征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匹配度较高。总体来看,正向异化区多分布于经济较发达或文化保护政策完善的东部沿海、北部边疆及政治中心,而负向异化区则集中于中西部内陆省份,凸显出区域差异对传统村落空间的协调性具有显著影响。

(三) 传统村落空间叠合分异影响因子探析

从传统村落“实体—表征”空间分布及分异特征看,传统村落的二元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和历史文化积淀息息相关,历史军事因素通过防御体系建设塑造了聚落的基本框架;自然环境条件通过资源承载力影响着村落的分布密度;当代城市化进程也加速了传统村落的空间重构。

1. 单因子探测结果

本研究使用地理探测器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历史文化3个维度解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传统村落空间异化贡献度的驱动因子,将各因子按自然断点法分为5类,最终得到因子探测结果(表4),各因子p值均小于0.05,统计学特征显著。河流密度(X2)和文物保护单位数量(X10)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因子,解释力分别达到0.65和0.52,对空间异化格局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表4 传统村落空间异化贡献度的因子探测结果

因子	自然地理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					历史文化因素	
	平均高程 X1	河流密度 X2	平均气温 X3	平均降水 X4	常住人口 X5	经济发展水平 X6	第三产业支出 X7	A级旅游景区数量 X8	城镇化率 X9	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X10	历史文化名镇数量 X11
q	0.09	0.65	0.32	0.54	0.37	0.18	0.18	0.22	0.25	0.52	0.25

注:p<0.05,说明各因子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其中,河流密度的高解释力揭示了长城沿线河谷平原地区由于兼具农业生产和文化交流的双重功能,水文条件在塑造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高解释力也说明其构成了传统村落实体空间的重要表征。在山西、河北等文物保护单位集中区域,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影响力:气候条件通过影响农业生产间接调节着村落的存续状态;而A级景区数和城镇化率相对较低的解释力则反映出,长城沿线旅游开发和城镇化进程对空间异化具有局部性影响,表现为京津冀等热点区域的实体空间“空心化”与表征空间“城市化”并存。

2. 交互作用探测

地理探测器的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各驱动因子对传统村落实体空间与表征空间异化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协同效应(表5)。文物保护单位与A级旅游景区的交互作用解释力最高,说明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与

表5 影响因子交互作用结果

指标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											
X2	0.48										
X3	0.78	0.54									
X4	0.61	0.15	0.59								
X5	0.61	0.57	0.54	0.20							
X6	0.18	0.38	0.12	0.03	0.40						
X7	0.18	0.38	0.12	0.03	0.40	0.18					
X8	0.11	0.33	0.60	0.10	0.36	0.43	0.43				
X9	0.28	0.11	0.01	0.09	0.64	0.15	0.15	0.71			
X10	0.76	0.71	0.53	0.38	0.54	0.51	0.51	0.76	0.73		
X11	0.46	0.51	0.33	0.18	0.24	0.31	0.27	0.56	0.48	0.22	

旅游开发的协同效应直接影响着空间异化格局,旅游设施的配套建设虽然促进了文化符号和表征空间的展示,却也伴随着传统村落实体空间的商业化改造,最终导致了两者的空间分离。同时,河流密度与文物保护单位的交互解释力达0.71,说明以自然生态为基础,以传统建筑为代表的文保单位叠加影响着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其余的显著交互组合包括:平均气温与平均高程协同构成村落空间分布的生态基底,城镇化率与A级旅游景区的双重压力导致了“文化表征景区化、村落实体空心化”现象,且常住人口与城镇化率共同改变着文化传承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展类因子的交互作用普遍较弱,说明经济因素并非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的核心驱动力。

民的热情和淳朴,让游客如沐春风并受益匪浅;而村里晚上的篝火晚会、各色美食,也吸引人们下次再来,说明公众在传统村落空间中的体验为其带来了良好的空间认同感和获得感。

四、传统村落空间整合重构的解域与构境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内传统村落实体空间与表征空间分布既密切相关又表现出非均衡性与区域分异性,这不仅是空间现象,更是深层结构性问题的外在表征。本文提出“解域—构境”应对路径,“解域”旨在打破实体与表征空间因资源错配、政策割裂或主体缺位导致的固化区隔,促进文化要素自由流动与再嵌入;“构境”则强调通过文化场景的创造性重构,动态建设“人—地—文”有机联结,实现传统村落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一) 传统村落“实体—表征”空间的结构性困境

当前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的挑战源于其空间格局的内在矛盾与外部治理环境的失调。

第一,资源分布的极化效应与边缘空心化。表征空间呈“单核集聚”(华北高密度区),而实体空间呈“多核分布”(华北—西北过渡带),这种“核心—边缘”结构导致了资源的空间极化。高密度核心区(晋冀豫三省)面临着资源过载风险,密集的文旅开发挤压着村落居民生活空间,导致传统文化被舞台化、商品化。低密度边缘区则陷入“保护性沉寂”的困境,区位条件与资源禀赋限制使其文化价值难以被有效激活,面临物质载体衰败与文化记忆遗失的双重压力。

第二,空间关系的区域分异与协同壁垒。重心模型和空间异化指数揭示了“实体—表征”空间在宏观尺度上的复杂图景。高异化区空间位错显著,极大增加了整体性保护的技术难度与制度成本。低异化区虽空间耦合度高,但也存在“千村一面”的同质化隐性陷阱,削弱了地方文化的独特吸引力。复杂的区域分异格局暴露了当前以行政边界为主导、缺乏跨区域协调机制的“碎片化”治理模式。

第三,驱动机制的复杂交织与政策供给错位。地理探测器的结果说明空间异化是自然环境基底、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及区域发展进程多维耦合的结果。其中遗产保护政策与旅游开发在实践层面产生了强关联,但这种关联常表现为对实体空间的商业化改造,可能导致其与原生空间的疏离。

(二) 传统村落空间“解域”与全要素协同

广义系统论认为若干要素组成了具有功能延展性的有机整体,系统整体使得原有的子单元具备了新的性质和功能,判断子单元的边界和内涵才能对其进行解构和重组,以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由实体空间和表征空间复合形成的传统村落,多元主体的共同记忆和文化认同是其生存发展的最佳土壤。“解域”要求超越空间边界的刚性约束,整合传统村落要素,以整体性视角重构流动性治理框架。

一方面,建立文化生态补偿区以平衡“核心—边缘”梯度差。在高密度核心区设立“开发强度阈值”,通过税收反哺机制将其文旅收益转移至低密度区,缓解资源虹吸效应。高异化分离区构建空间耦合走廊,在农耕文明代表村落嵌入非遗工坊,在绿洲农耕带恢复游牧文化仪式空间,促进空间的功能性缝合。在低密度边缘区实施“文化基因库”计划,通过数字化存续、跨村落传承人联盟维系文化血脉。另一方面,创新跨尺度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网络。构建“省际联席会—村落共同体”治理架构,统筹制定空间异化指数监测体系,动态评估整体保护效能;成立省际协同保护基金,支持跨界文化线路联合申报与运营;在基层推行村民赋权,保障居民在旅游分红、技艺传习和空间改造中的决策权,避免主体性失语。后工业化浪潮下,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保护和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机遇。需关注乡村多元空间的尺度和特征,关注不同地区传统村落的差异化发展阶段及其要素整合需求,关注公众的乡土归属感和集体记忆延续,而非简单地放大单一要素或要素群在村落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成为全要素协同激发传统村落内生动力的底层逻辑。

(三) 传统村落空间的“构境”与场景式再生

传统村落的核心价值在于乡愁的维系和文明之根的延续。传统村落的核心价值在于乡愁的维系和

文明之根的延续。地方环境、文化符号与社群活动在特定场景中交汇,共同生成传统村落特有的文化生命力;这种场景式蜂鸣借由具身实践,在日常生活与仪式展演中实现了传统村落的空间构境与再生。

第一,转译家国性符号,实现秩序空间的当代叙事与功能再生。盘点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将古街道、代表性传统民居等符号系统转化为“家园记忆”展陈,以沉浸式剧场重构“仪式剧场”,实现物质载体的场景化转型和空间权力的拓扑转化。第二,赋能公共空间,重塑仪式场景与社会交往。增设“乡贤议事厅”“村规民约讲堂”,强化其精神凝聚力;在井台、桥头嵌入“乡音广播站”“手艺市集”,对日常空间进行升维;邀请游客参与社戏祭仪等,实现节庆空间共创。第三,深化村落场景具身体验,链接身体实践与地方意义。开发生产性实践项目,实现劳动身体的文化传递;结合仪式化参与,唤醒集体文化记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讲述传统村落故事,拓展表征空间的感知维度。

当前,高速度、快节奏的社会现状往往使人们陷入迷茫和失衡,村庄空间也被持续挤压,乡村“失魂”风险显现。传统村落的乡村场景则创设了一种诗意栖居的理想图景,可由场景精神链接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要素,传承和发展民间文艺和农耕文化,完善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设计,通过舒适度升级重拾乡土记忆,打造宜游宜居的传统村落新场景,以满足新时期居民和游客的需求。

本研究虽对传统村落实体与表征空间的叠合分异进行了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方面的尝试,但亦存在若干局限。首先,本文主要采用截面数据,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尺度依赖性和数据动态性方面的局限。其次,研究结论是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一特定中观尺度下得出的,其普适性受尺度依赖制约。最后,以传统村落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空间的可操作性对应虽具合理性,但仍无法完全涵盖未被名录认定的、弥散性的地方性知识与情感。据此,未来研究可致力于构建长时序面板数据、运用准实验设计以强化因果识别、开展多尺度比较分析,并结合微观空间民族志等混合方法,深化对传统村落空间复杂性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刘沛林. 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 [3] 冯骥才. 文化先觉 冯骥才文化思想观. 银川:阳光出版社,2014.
- [4] 余压芳,庞梦来,张桦. 我国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研究综述. 贵州民族研究,2019,(12).
- [5] 冯淑华. 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空间演化论.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 [6] 余维君. 传统村落“社会—空间”的理论内涵、关联形式与保护路径. 城市发展研究,2023,(10).
- [7] Mohammed Mashary Alnaim. Discovering the Integrative Spatial and Physical Order in Traditional Arab Towns: A Study of Five Traditional Najdi Settlements of Saudi Arabia.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2022, 34(2).
- [8] 何庆华. 从“地方”到“类地方”: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传统村落的空间重构. 贵州社会科学,2023,(3).
- [9] 陈波,徐若蓝.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与价值生成——以二官寨为例. 中国软科学,2022,(12).
- [10] 曹海林. 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 天府新论,2005,(4).
- [11] 鲁可荣,程川. 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与乡村文化传承——以浙江三村为例.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 [12] 杨馥端,窦银娣,李伯华等. 符号消费与场域转换: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变与重构. 地理研究,2023,(8).
- [13] 杨灿灿,万城,何发等. 皖西大别山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2023,(3).
- [14] 方叶林,陆海云,黄震方等. 中国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经济地理,2023,(9).
- [15] 何小芊,厉峰,高军波等. 基于地理网格的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地理科学,2024,(6).
- [16] 刘春腊,徐美,刘沛林等.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及湘西实证. 地理学报,2020,(2).
- [17] 李伯华,张浩,窦银娣等. 景观修复与文化塑造: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与符号构建——以湖南省通道县皇都侗文化村为例. 地理学科进展,2023,(8).
- [18] 李如友,石张宇.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关系及形成机理. 经济地理,2022,(8).

- [19] 牛彦龙,王毅.海河流域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关联机制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5,(5).
- [20] 余正勇,赵双.西南地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24,(3).
- [21] David Harvey. *Justice, Nature &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1996.
- [22] 吴必虎,罗德胤,张晓虹等.中国传统村落概论.深圳:海天出版社,2020.
- [23] 周尚意.触景生情 文化地理学人笔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24] 章荣君,张向向.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社区共同体空间营造:内在机理、现实反思与发展路径.求实,2025,(3).
- [25] Edward W. Soja.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26] 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研究,2010,(5).
- [27] 张晓瑞,顾天飞,卫辉.云贵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资源开发与市场,2024,(1).
- [28] 居肖肖,杨灿灿,赵明伟等.浙皖陕滇四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22,(2).
- [29] 唐明贵,胡静,唐晓飞等.贵州古村落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理.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2,(11).
- [30] 陈国瑞,王薇,左丹.浙江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安徽建筑大学学报,2023,(1).
- [31] 李天宇,陆林,任以胜等.浙江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资源开发与市场,2020,(6).
- [32] 翁钢民,盛开,潘越.国内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基于全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1,(4).
- [33] 王莎莎,林珍铭.桂林市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3,(5).

The Overlapping and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Physical-representational" Spaces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the Great Wal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ang Yating (Shanxi University)

Tery N. Cla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serve as crucial spatial carrier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eir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have evolved beyond mere physical preservation to a holistic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n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Within the Great Wal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ese villages exhibit pronounced imbalanced 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both physical and representational dimensions. This spatial patterning arises from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play of factors such a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al base, cultural heritage polic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To address these disparities, it is possible to establish cultural-ecological compensation zones to mitigate the core-periphery spatial gradient, innovate cross-scale governance networks, and employ scene-based regeneration strategies. These approaches can translate national and cultural symbols, revitalize ritual spaces, and enhance embodied experiences, thereby reconstruct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among "people-place-culture". Such efforts will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a "heritage discourse" to "spatial production", ultimately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physical spac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the Great Wal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 作者简介 庞亚婷,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山西 太原 030006;

特里·N. 克拉克,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伊利诺伊州 芝加哥 60637。

■ 责任编辑 何坤翁